

国名?? "西班牙" 的成立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untry name "Xi Ban Ya"(西班牙)
著者	沈 和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 = Journal of East Asian cultural interaction studies
volume	15
page range	119-130
year	2022-03-31
URL	http://doi.org/10.32286/00026543

国名译词“西班牙”的成立

沈 和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untry name “Xi Ban Ya”(西班牙)

SHEN He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long with the great discoveries of Western geography, knowledge of Western geography began to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Jesuits represented by Matteo Ricci and Giulio Aleni took the lead in translating foreign geographical names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ntroduced Wester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to the vision of Chinese readers through media carriers such as maps and geography books. However, after the 18th century, following the KangXi, YongZheng, and QianLong ban on educ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was interrupted. It was not until Robert Morrison and other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came to China to reuse the resource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Jesuits, and the long-covered knowledge of Western geography and a large number of translations of country names were re-introduced into China. Afterwards, Chinese intellectuals who “opened their eyes to see the world” conducted a summary and selec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and translations of country names. Finally, after the Opium War ende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author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the finalization and un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national names with serious differences were completed.

Nowadays, the country name “Spain (Spanish: España)” can be written as the Chinese character “Xi Ban Ya” (西班牙) in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But before the translation of national names were completely finaliz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tages, “Xi Ban Ya” (西班牙) had a variety of translated word f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this article sorts out and counts the translated word forms of “Xi Ban Ya” (西班牙) in various typ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documents in the period of about 300 years from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o the “May Four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Discuss its usage and translation characteristics at various stages, and focus on the use of the country name translation “Xi Ban Ya” (西班牙) by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in diplomatic situation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plomatic materials o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inally, starting from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country name “Xi Ban Ya” (西班牙)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he process of finalizing the country name translation “Xi Ban Ya” (西班牙) in China and Japan is discussed from the theory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the Chinese character vocabulary system.

Keywords: Translation of national names; “Xi Ban Ya”(西班牙); Chinese character vocabulary system; Language contact

关键词：国名译词 西班牙 汉字词汇系统 语言接触

一 前言

伴随着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更多的新航路被欧洲人开辟。西方地理学也迎来了飞速发展，并在明末开始涌入中国，影响、辐射了中国及周边国家。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和明朝官员李之藻的《坤輿萬國全圖》（1602）是中国第一幅完整的经纬世界地图，在日本也曾被多次翻印摹抄，一贯被认为是“西学东渐”的代表作¹⁾。图中的 1114 个地名，诸如“以西把你亞”、“拂郎察”、“諳厄利亞”这样的外来国名译词开始为国人所接触，并逐步进入汉字词汇系统。随后的时间里，这些国名译词又依托地图、地理书、报刊等各种类型的载体开始在亚洲文化圈内传播，并在中、日两国间，形成文化上的“反哺”，构建了国名译词在东亚文化圈内从相互影响借鉴到定型统一的内循环。

据邹正环统计，明末以来，外国传教士与中国知识分子编译、出版的地理学译著、教科书及地图册近 400种²⁾。不过，由于作者们受宗教信仰、母语差异、译本语源、汉语水平、方言受容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致使这些外来国名译词在逐步进入汉字词汇系统时，产生不同程度的歧义，呈现多种类，多派别的译词形式。本文将以“Spain（西语：España）”为例，从汉字词汇系统和语言接触的视角对该国名译词的历史由来，以及在不同时期中、日两国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国名译词发生歧义的原由和统一定型的过程方面阐述国名译词“西班牙”的定型过程。

二 “西班牙”译词形式的概要

西班牙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先行者，依托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航海技术，率先开辟了诸多新航路。成为较早的，与世界其它大洲进行文化、贸易等方面交流的西方国家之一。西班牙一国的国名译词形式也被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所翻译，较早地被中国人所接触。

关于外国传教士转译国名译词的特点和所分派别，徐继畲《瀛寰志略》（1848）总结如下：“泰西人於漢字正音不能細分……泰西各國語音本不相同……英人所譯，字數簡而語音不全，葡人所譯語音雖備，而一地名至八九字。”³⁾徐认为英国新教一派传教士翻译地名时，字数少且简练，但存在发音不够准确完备的问题。葡萄牙耶稣会士一派传教士在翻译地名时，由于注重转译地名发音的准确性，造成使用汉字太多，使得国名译词过于冗长。

如徐所说，地名转译分耶稣会士派和新教传教士派。纵观早期来华耶稣会士的地图、书籍和之后新教传教士及中国作者的各类文献。“西班牙”的国名译词形式从翻译类型上进行分类，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根据西班牙语“España”的发音进行音译国名译词，即属耶稣会士一派的译词。例如：“以西把你亞”、“依西把尼亞”、“意細班惹呢”等。

第二类，根据英语“Spain”的发音进行音译的国名译词，即属新教传教士一派的译词。例如：“士扁”、“是班牙”、“西班牙”等。

1) 李兆良：《坤輿万国全图解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第9页。

2)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17页~420页。

3) 徐继畲：《瀛寰志略》，棧雲楼，1873年影印本，第8页。

第三类，以该地区旧称进行音译的国名译词。例如：“噫啤哩啞”、“意卑里”等。

第四类，音译兼意译的国名译词。例如：“大呂宋”。

为探究国名译词“西班牙”的由来、变化和定型。笔者整理了明末清初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约 300年间，来华传教士和中国人所著的地图、书籍、报刊、杂志和字典中国名译词“西班牙”的译词形式。涉及文献共 51 种，涵盖了不同阶级属性、文化教育背景和宗教信仰的中、西作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文献也都在不同时期被广为流传，具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和代表性。统计如下表 1 所示：

表 1：国名译词“西班牙”统计表⁴⁾

来华传教士及中国作者文献名	时间	文献类型	作者	“西班牙”的译词形式
《坤輿萬國全圖》	1608	地图	利玛窦、李之藻	以西把你亞
《職方外紀》	1623	书籍	艾儒略	以西把尼亞
《坤輿萬國圖說》	1674	书籍	南怀仁	以西把尼亞
《明史》	清初	书籍	—	依西把尼亞、干絲臘
《身見錄》	1721	书籍	樊守义	巴斯尼亞
《海國聞見錄》	1730	书籍	陈伦炯	干絲臘、是班牙
《察世俗每月統紀傳》	1815~1821	报刊	米怜等	士扁、大呂宋
《英華字典》	1815~1823	字典	马礼逊	大呂宋
《新舊約全書》	1816~1822	书籍	马士曼、拉撒	士巴尼
《西遊地球聞見略傳》	1819	书籍	马礼逊	大呂宋、西便
《地理便童略傳》	1819	书籍	麦都思	大呂宋、士便
《海國四說》	1820	书籍	梁廷枏	以西把尼亞
《海錄》	1820	书籍	谢清高	大呂宋、意細班惹呢
《神天聖書》	1823	书籍	马礼逊、米怜	士巴尼亞
《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	1833	报刊	郭实猎、马儒翰等	西班牙、西班牙、是班牙
《古今萬國綱鑑》	1838	书籍	郭实猎	西班牙
《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1838	书籍	裨治文	西班牙
《四洲志》	1839	书籍	林则徐等	大呂宋、西班牙
《澳門新聞紙》	1839~1840	报刊	林则徐等	大呂宋
《華事夷言》	1844 以前	书籍	梁发	大呂宋
《海國圖志》	1843~1852	书籍	魏源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肆班斯苛、斯扁、倚西把尼、以西把尼亞、伊西巴尼亞、伊西巴泥亞、依西把尼亞、以西抱尼亞、意細班惹呢、大呂宋、大西洋、呂宋、意卑里亞、義斯巴尼亞
《萬國地理》	1844	书籍	米怜	是班牙
《亞墨理格洲合省國志略/亞墨理格合眾國志略》	1844	书籍	裨治文	西班牙
《英華韻府歷階》	1844	字典	卫三畏	大呂宋
《外國史略》	1847	书籍	马礼逊父子	西班牙
《新釋地理備考全書》	1847	书籍	玛吉士	口義 ⁵⁾ 晒吧呢啞、噫啤哩啞、大呂宋
《英華字典》	1847~1848	字典	麦都思	呂宋、大呂宋

4) 为避免歧义，文中所有表格和正文中出现的中文文献名均使用繁体字。日本文献名使用日本汉字。

5) 原文为“口”字旁加“義”的单个汉字。

《瀛寰志略》	1848	书籍	徐继畲	是班牙、斯扁亞、是便、干絲臘、義斯巴尼亞、以西把尼亞、大呂宋、意卑里
《遐邇貫珍》	1853~1856	报刊	麦都思等	呂宋、大呂宋、西班牙
《智環啟蒙塾課初步》	1856	书籍	理雅各	西班牙
《地球說畧》	1856	书籍	祜理哲	大呂宋、西班牙
《六合叢談》	1857	报刊	麦都思、韦烈亚力等	西班牙
《地理全志》	1859	书籍	慕维廉	西班牙
《新舊約全書》	1859~1863	书籍	裨治文、克陸存	士班雅
《大美联邦志略》	1861	书籍	裨治文	士班雅
《萬國公法》	1864	书籍	丁韪良	西班牙
《英華字典》	1866~1889	字典	罗存德	大呂宋、西班牙
《教會新報》	1868~1874	报刊	林乐知等	日斯巴尼亞、大日斯巴尼亞
《萬國公報》	1874~1907	报刊	林乐知等	西班牙、日斯巴尼亞、大日斯巴尼亞
《英粵字典》	1870	字典	湛约翰	呂宋
《中西聞見錄》	1872~1875	报刊	丁韪良、艾约瑟等	西斯巴尼亞、呂宋、西班牙
《英華萃林韻府》	1872	字典	卢公明	大呂宋、西班牙
《繪地法原》	1873~1899	期刊	金楷理、林乐知等	西班牙
《循環日報》	1874~1947	报刊	王韬等	呂宋、大呂宋、西班牙
《西國近事匯編》	1875	书籍	金楷理、林乐知等	西班牙
《萬國通鑑》	1882	书籍	谢卫楼	西班牙
《環游地球軍商行船備要》	1897	书籍	丁岳	西班牙
《新約全書》	1897	书籍	湛约翰、韶玛亭	士班雅
《華英字典集成》	1899	字典	邝其照	大呂宋、西班牙
《新舊約聖經》	1902	书籍	施约瑟	司班雅
《英華大辭典》	1908	字典	颜惠庆	西班牙、呂宋、日斯巴尼亞
《官話》	1916	字典	赫美玲	西班牙亞、呂宋

通过对表 1 中时间跨度约 300 年的 51 个文献中国名译词“西班牙”的整理和统计，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1. “西班牙”的译词形式以音译为主。音译的方式可以尽可能地让转写出的汉字国名，发音上更趋近于转写对象原有发音。同时，音译词在转写时一般不被赋予实际意义，能够尽量地不破坏源语言的词义。表 1 中音译的译词形式大部分都遵循了上述原则，主要对西班牙语“España”和英语“Spain”进行了汉字形式的转写。也有少量的译词形式是通过旧称音译而来，如：“噫啤哩啞 (Eberia)”、“意卑里亞”和“意卑里”即伊比利亚，指的是西班牙南部和东部的史前民族之一的伊比利亚人，或指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在少量文献中特指西班牙。

较为特殊的是，吕宋岛原本是菲律宾重要的岛屿，但由于西班牙是菲律宾宗主国的关系。除书籍《海國圖志》(1843~1852)和报刊《遐邇貫珍》(1853~1856)外，鸦片战争后的几部英华字典中收录的“Spain”的词条下，也直接将“Spain”翻译为“呂宋”，也属于音译词。为对“西班牙”所有的音译词形式进行统计和说明，故将上述音译词整理为表 2：

表 2：“西班牙”的音译形式统计表

转译对象	汉字的转译形式
España	以西把你亞、依西把尼亞、巴斯尼亞、倚西把尼、以西把尼亞、伊西巴尼亞、伊西巴泥亞、意細班惹呢、以西抱尼亞、意細班尼惹、口義晒吧呢啞、義斯巴尼亞、日斯巴尼亞、士巴尼亞、士巴尼
Spain	是班呀、士扁、西便、士便、西班牙、西班牙、是班牙、西班牙、士班雅
Eberia	噫啤哩啞、意卑里亞、意卑里
Luzon	呂宋

统计结果显示：

在 28 种音译英译形式中，“España”的转译形式最多，共 15 种；“Spain”的转译形式共 9 种；“Eberia”和“Luzon”的转译形式相对较少，仅 4 种。由此看见，“España”和“Spain”是主要的转译对象。

全译、节译、增译是三种不同的音译方式。相同转译对象，如果选择的音译方式不同，译词也会不同。如：“以西把你亞”使用了全译的音译方式，“以”对应“E”，“西”对应“s”，“把”对应“pa”，“你亞”对应“ña”。“倚西把尼”属于节译的音译方式，会省略尾音“a”不译，“意卑里”也属于节译。而“是班呀”、“是班牙”、“西班牙”都属于增译的音译方式。

2. 音译兼意译或完全意译的相对较少。音译兼意译的译词形式仅有“大呂宋”1种形式，“大”是意译，原因是西班牙是菲律宾的宗主国，“呂宋”由“Luzon”音译而来。该译词形式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以后，一直被各类型文献使用和收录。完全意译的国名或地名有独立、固定的命名理据，因而在众多类型的文献中记载都较为统一，不存在像其它译词种类那样的歧义。但由于这样的译词受历史和不同时期人们认知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取代，“干絲蠟”就是这类译词。如表 1 所示，该译词形式只出现在清朝初年的 2 种文献中。进入 19 世纪后，除被鸦片战争后出版的《瀛寰志略》（1848）收录外，在表 1 其它的 48 种文献中均无记载。

3. 相同作者在不同文献中使用了不同的译词形式。国名译词形式的统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一作者在不同文献中使用的译词形式存在差别的情况非常常见。如：马礼逊在《英華字典》（1822）中将“西班牙”记作“大呂宋”，而在次年的《神天聖書》（1823）中又使用了耶稣会士一派的，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将“西班牙”译作“士巴尼亞”。此外，湛约翰（Chalmers John）在《英粵字典》（1870）中“Spain”的词条下，将其译作“大呂宋”，而在《新約全書》（1897）中又翻译作“士班雅”。显然这些例子都是前后矛盾的，甚至出现新教传教士使用耶稣会士的译词形式的情况。这也侧面反映出，当时新教传教士对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留下资源的再利用和国名译词的再导入。

4. 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未受鸦片战争前后尾音统一化进程的影响。“ia”作为词缀，据有明显的拉丁语特征，通常转译为“你亞”、“尼亞”、“泥亞”等近音或同音异字的形式。但由于在鸦片

战争前后，大量的国名译词开始进入汉语词汇系统，造成了国名译词的严重分歧⁶⁾。

魏源为统一和简化国名译词，在《海國圖志》(1843-1852)第四十三卷《意大里亞國總記》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凡地名未亞字、阿字，皆其餘聲，可有可無，故意大里亞，一作伊達里。”⁷⁾ 魏源认为地名中的尾音“亞”、“阿”可以进行删除，开始有意对尾音进行统一。如：现行使用的国名“奥地利(Austria)”、“意大利(Italia)”、“波兰(Polonia)”都是尾音统一化最终的结果。

反观表1中“西班牙”的尾音统一化进程。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国名译词中的尾音“尼亞”一直都未被完全去除或统一，鸦片战争后依然有“義斯巴尼亞”、“以西把尼亞”、“日斯巴尼亞”等译词形式。反而是以“Spain”为转译对象的国名译词的尾字，逐步由“呀”、“雅”、“亞”等统一为“牙”。

5. 同音、近音字和异体字的使用。为说明各译词形式中，同音、近音字和异体字的使用状况，笔者将各转译对象中的拉丁字母或字母组合形式进行拆分，并将所有被使用过的同音、近音字和异体字按拉丁字母或字母组合整理。如表3：

表3：国名译词“西班牙”中同音、近音字和异体字的使用状况统计表

转译对象	对应字母	同音、近音字和异体字
España	e	以、依、倚、伊、意、口義、義、日
	s	西、斯、細、晒
	pa	把、巴、班、抱、吧
	ña	你亞、尼亞、泥亞、呢亞、尼惹
Spain	s	是、士、西
	pa	班、巴
	in	呀、亞、雅、牙
	pain	扁、便
Eberia	e	噫、意
	be	啤、卑
	ri	哩、里
	a	亞

通过表3统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首先，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国名译词所使用到的同音、近音字最多，且有异体字。如：“抱”为“把”的异体字。

其次，若将转译对象中的拉丁字母拆分为单个字母或字母组合，并查看其所对应汉字。不难发现，即使转译对象不同，相同的单个字母或字母组合所对应的汉字有完全一致的情况。如：“España”中的首字母“E”对应的汉字“意”与“Eberia”中的首字母“E”对应的汉字“意”是一致的。“España”中的“s”

6) 李运富、牛振：《鸦片战争前后国名译词考察——以〈海国图志〉为例》，《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8年第21期，第128页~140页。

7) 魏源：《海国图志》，同治七年（1868）重刊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对应的汉字“西”与“Spain”中的“s”对应的汉字“西”是一致的。不同转译对象中频繁使用相同汉字对“西班牙”的最终定型起推进作用。

6. 部分译词受粤方言影响。国名译词“葡萄牙”中“牙”字的转译受粤语发音的影响，读作“ga”。杨帅可指出，国名译词“波爾杜瓦爾”中的“瓦”和“葡萄牙”中的“牙”对应“Portugal”中“ga”的读音，都属于中古疑母字，读为舌根鼻音，在明清部分南方方言中读为舌根塞音，今闽语、客语仍有个别方言点读为g⁸⁾。

反观国名译词“西班牙”，其译词形式与“葡萄牙”类似，都带有“牙”字，但转移对象“España”和“Spain”中均未有“ga”的字母组合。我认为这样翻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两国历史和地理位置上来看，葡萄牙和西班牙曾经是一个国家，并且是邻国。译者在转译的时候，为尽量避免读者在阅读时产生地理位置上的认知错误，方便受众记忆和接受信息，故使用了与国名译词“葡萄牙”相似的结构进行转译。

其次，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对“西班牙”的翻译和使用起重要作用。首先，观察表1可知，从时间上看，最先使用“西班牙”译词形式的文献是郭实猎、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等人的报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1833），郭实猎在之后的《古今萬國綱鑑》（1838）也同样使用了这一译词形式。另外，郭实猎的母语是德语，在德语中，“西班牙”写作“Spanien”，其发音与“西班牙”相似。“S”发音大致同“士”，“pa”发音大致同“班”。再者，郭实猎与另一位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相识，并向其学习汉语。而麦都思来华之初是在马六甲学习的汉语，受南方音的影响，而“牙”字的翻译正是翻译者受南方音影响的一个证据。麦都思在其负责的报刊《遐邇貫珍》（1853~1856）和《六合叢談》（1857）中也直接延用了“西班牙”的译词形式。

最后，观察表1还可以发现，与郭实猎一样身为“在华传播益智会”秘书的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用了国名译词“西班牙”的同音异字形式“西班牙”和“士班雅”。这侧面反映了郭实猎使用的译词形式影响了其他作者对“西班牙”的使用。

三 “西班牙”译词形式的演变考察

1. 不同时期各类文献中国名译词“西班牙”的演变过程

“España”最初的词源可以追溯到希腊语中的“Ἑσπερία”。该词原本是希腊中心视角下对意大利的称呼，而西班牙则被称为“Ἑσπερία ὑλιμία”，是更远的极西之地⁹⁾。后来西班牙语的“España”来自伊比利亚语“Hispalis”，意为“西方的城市”、“西域”或“日落之地”。15世纪末诞生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伊斯帕尼亚王国，其国名又缘于罗马统治时代的半岛地名希斯帕尼亚（Hispania）州。再后来，英语和荷兰语则省

8) 杨帅可：《从“波爾杜瓦爾”到“葡萄牙”——Portugal 国名译词的演变考析》，《亚洲与世界》2021年第四辑，第121页。

9) A System of Ancient and Mediaeval Geography for the Use of Schools and Colleges, Charles Anth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14.*

掉罗马地名希斯帕尼亚语头的“Hi”音节和词尾的“ia”后缀，把它读作“Spain”。笔者认为国名译词“西班牙”中“西”的翻译是译者刻意强化该词词源中“西边”的含义。

从表1中的51个文献的时间分布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明末清初、鸦片战争前、鸦片战争后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西班牙”的译词形式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时，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各类文献中对西班牙国家概况的介绍及认知也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各自特点。

明末，伴随着西方地理大发现，西方地理学知识开始传入中国。以利玛窦、艾儒略（Giulio Aleni）等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率先开始将外国地名进行汉字形式的转译，并通过地图、地理书等媒介载体将西方地理知识引入到中国读者的视野中。在这个阶段，外来国名译词主要的载体是地图，利玛窦利用自身对西方地理学知识的储备，在明朝士大夫的帮助下，参考运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所记录的资料和文献所绘的《坤輿萬國全圖》（1608）影响了中国及周边国家。这个时期“西班牙”的译词形式比较单一，都是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清朝初年，中国作者的文献中开始出现“西班牙”的译词形式。这些译词形式一部分是沿用耶稣会士的转译，还有一部分是“干絲蠟”这样的特殊译名。陈炯伦首次使用了“西班牙”的同音异字的译词形式“是班牙”。不过由于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汉译西书的传入开始中断。

直到19世纪初，马礼逊来华，他和其后来华的传教士们通过翻译圣经、出版定期刊物等方法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播，即“文书传教”。在这些《圣经》的翻译中，出现了很多耶稣会士的转译形式，如：《神天聖書》（1823）中，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转译出的“士巴尼亞”就是对耶稣会土地名转译的知识再导入。此外，新教传教士们也以“Spain”为转译对象创造属于自己一派的译词形式。马礼逊《西遊地球聞見略傳》（1819）以“Spain”为转译对象将其转译为“西便”。同年，麦都思的《地理便童略傳》（1819）也以“Spain”为转译对象，转译作“士便”。不过这些早期的地理书由于篇幅较短且信息量有限，未能对当时中国的学术界产生冲击¹⁰⁾。此后，郭实猎《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1833）和《古今萬國綱鑑》（1838）中首次使用了有别于前人译名的“西班牙”的译词形式。鸦片战争前，外来国名译词开始大量进入汉字词汇系统，国名译词出现了严重分歧。

鸦片战争后，由于清政府的战败，满清高层迫切希望更进一步了解世界，大量地理书开始孕育而生。在这些地理书的作者中，有像玛吉士（José Martinho Marques）等人这样的汉学家，也有像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等人的新教传教士，他们都为国名译词的统一提供了丰富素材。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士大夫魏源的《海國圖志》（1843~1852）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这两部作品是该时期中国作者认识世界的集大成者，两部作品在对“西班牙”译词形式的总结和归纳共23种，几乎囊括了鸦片战争前出版文献中所有的译词形式。两位作者对先前文献中国名译词的筛选和类化，对存在原本严重分歧的国名译词进入汉字词汇系统后的优化起重要作用。抛开书中一些知识性的错误不谈，这两部作品为国名译词的进一步筛选和统一提供了一个完整、详细的资料库。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间，麦都思、理雅各（James Legge）、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裨治文等传教士的著作中都开始固定使用“西班牙”的译词形式。特别是一个名为益智书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的新教传教士教育组织开始对各领域中的各类专业术语和译词

10)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Matthew W. Mosc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214~216.

进行翻译上的统一。其中地理名词由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编辑，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负责提供专有名词¹¹⁾。同时，林乐知还兼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前后共 16 年。他所参与编辑或翻译的《萬國公報》（1874~1907）、《繪地法原》（1873~1899）、《西國近事匯編》（1875）等，均统一使用“西班牙”的译词形式。笔者利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¹²⁾对“西班牙”一词进行检索，发现该译词形式在此时间段内共有 593 项结果，而其中《萬國公報》（1874~1907）占 106 项，为该时期最多，《西國近事匯編》（1875）也累计检索出 20 项。而在同样为林乐知主编的《教會新報》（1868~1874）中却无法检索出“西班牙”的译词形式，反而全是“日斯巴尼亞”的译词形式。这也侧面反映了益智书会的传教士们在《教會新報》（1868~1874）更名为《萬國公報》（1874~1907）后逐步减少了“日斯巴尼亞”的使用，有意对国名译词“西班牙”进行统一，并完成其最终的定型。

2. 外交场合的译词形式及使用状况

鸦片战争后，列强开始大肆瓜分中国，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1844 年，第一位西班牙外交官西尼巴尔多·玛斯（Sinibaldo de Mas）抵达中国，先后于澳门、上海和厦门设立领事馆。1864 年，他与清政府签署了第一份中西条约，即《中西和好貿易條約》（1864）。

笔者认为条约作为一种正式的、具有界标性质的外交公文，其中外国国名的翻译形式对国名译词的定型起重要作用，有被译者们参考的可能性。故将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西班牙签订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不平等条约及当中“西班牙”的译词形式整理为表 3：

表 3：清政府与西班牙签订的条约和外交证明文件

条约名称	签订时间	资料类型	“西班牙”的译词形式
《中西和好貿易條約》	1864.10.10	条约	日斯巴尼亞、西班牙
<i>Credenciales de Sinibaldo de Mas como agente Qing destinado a Portugal</i>	1868.6.29	外交证明	日斯巴尼亞
《古巴華工條款》	1873.10.22	条约	西國
《會訂古巴華工條款》	1877.11.17	条约	西國
《日斯巴尼亞國條約》	1878.12.6	条约	大日斯巴尼亞
《辛丑條約》	1901.9.7	条约	大日、日斯巴尼亞

如表 3 所示，清政府在外交场合使用的“西班牙”的译词形式以“日斯巴尼亞”为主，有同音异字的“日斯巴尼亞”或“大日”这样的简称。而“西班牙”和“西國”的译词形式使用的相对较少。

此外，为进一步探究清政府灭亡后，中华民国政府在外交场合对“西班牙”译词形式的使用状况。笔者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资源网¹³⁾，检索、并整理了部分“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政府与西班牙来往的外交公函、照会等资料中“西班牙”的译词形式，如表 4 所示。

11) 王扬宗：《清末益智书会统一科技术语工作述评》，《中国科技史料》1991年2期，第9~19页。

12) 全国报刊索引《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https://www.cnbkssy.com/>。该数据库收录了 1833~1911 百余年间出版的三百余种期刊，包括《教會新報》、《萬國公報》、《西國近事匯編》等，是对晚清益智书会期刊全面而完整地呈现。

13) 台湾中央研究院数位典藏资源网：<https://digiarch.sinica.edu.tw/>。

表4：中华民国政府与西班牙的外交资料统计表

资料名	时 间	资料类型	“西班牙”的译词形式
《日斯巴尼亞國欽命駐華全權公使白斯德覲見大總統呈遞接任國書頌詞》	1914.1	颂词	日斯巴尼亞
《蘇城獅子林李園被封後日斯巴尼亞國領事要求發還請照約駁》	1914.2	电文	日斯巴尼亞
《印送日斯巴尼亞待遇交戰國或中立國之潛水艇駛入領海辦法》	1918.6	照会	日斯巴尼亞
《日斯巴尼亞國承認塞爾維亞克魯斯拉文國事》	1919.8	照会	日斯巴尼亞
《摩洛哥境內歸日斯巴尼亞國保護之區境加入萬國郵會請查照備案》	1920.12	公函	日斯巴尼亞
《通知日斯巴尼亞國贊成華會通過關於中國各議案事知悉》	1923.2	公函	日斯巴尼亞
《函送日斯巴尼亞國管理農牧章程第九條》	1924.12	公函	日斯巴尼亞
《日斯巴尼亞國公使覲見日請派軍警照料》	1925.4	公函	日斯巴尼亞

表4 统计结果显示：

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在与西班牙的外交活动中，没有使用“西班牙”的译词形式，而完全延用了清代的译词形式“日斯巴尼亞”。对照前文表1来看，“日斯巴尼亞”其实已经在益智书会传教士林乐知的《教會新报》（1868~1874）和《萬國公报》（1874~1907）里有使用。笔者利用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对“日斯巴尼亞”进行检索，结果共306项。而上述两个报刊中该译词形式所占检索项的数量为该时期最多，共266项。

但在《教會新报》（1868~1874）更名为《萬國公报》（1874~1907）后，“日斯巴尼亞”的使用频率逐步减少，转而大量使用“西班牙”。故笔者认为中华民国政府各类条约和外交场合沿用译词形式“日斯巴尼亞”，并没有紧跟国名译词的统一进程，因此未对国名译词“西班牙”的定型起有效推进作用。反倒是在1937年中日正式开战后，为避免“日斯巴尼亞”的简称“大日”或首写汉字的“日”与交战国“日本”混淆，从而逐步将外交场合所使用的译词形式统一为“西班牙”。

相反，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和好貿易條約》（1864）、《古巴華工條款》（1873）、《會訂古巴華工條款》（1877）中使用的“西班牙”和“西國”。一方面，上述条约中多种译词形式的使用，反映出当时外来国名译词在进入汉字词汇系统后出现分歧并逐步统一的现象。另一方面，从时间和空间上看，此时正对应了1854年“黑船事件”后，也对应了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等典籍流入日本的时间。因此，笔者认为，这些条约中出现的“西班牙”和“西國”的译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推进了国名译词“西班牙”在中国国内的定型，也由于条约的界标性质及其一定的参考价值而流入刚刚结束锁国不久的日本。

四 日本文献中国名译词“西班牙”的定型

从利玛窦来华，到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一直通过汉译西书了解世界。而了解西方地理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耶稣会士翻译的国名译词和他们绘制的地图、译述的地理书籍。尤其是在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期通过荷兰语的书藉吸收西方新知识的兰学兴起，其主要内容为医学、化学等。江户时代，来华耶稣会士的著述的流入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然而传入日本的汉译西书在流通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阻碍，如艾儒略的《職方外紀》（1623）有很多抄本在知识阶层流传，所以这些书仍然是兰学家最重要的知识源泉之一¹⁴⁾。

14) 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33~234页。

但 18 世纪以后，伴随着康、雍、乾的禁教政策，西书的翻译和更新被迫中止，汉译西书流入日本的进程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逐步陷入停滞状态。因此日本的兰学家开始亲自翻译西书。如新井白石《采覧異言》（1713）和《西洋紀聞》（1715）、森島中良《萬国新話》（1789）、山村昌永《訂正増訳采覧異言》（1802）、箕作省吾编译《坤輿図識》（1845）等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在兰学家的作品中，“西班牙”的译词形式也多是保留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并没有创造新的译词，而是以同音异字或者变体的形式出现。

1854 年发生了“黑船事件”，日本被打开国门。1859 年日本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国出版的汉译西书、英华字典等随即大量传入日本。截至明治初期，中国的汉译西书是日本接受西方知识的一个重要途径，可以称之为“中国途径”¹⁵⁾。为阐明国名译词“西班牙”在日本的定型过程，笔者整理了 22 种从 18 世纪初到 20 世纪初，时间跨度约 200 年的各类日本文献中“西班牙”的表記形式，如表 5 所示：

表 5：日本文献中国名译词“西班牙”统计表

日本文献名	时间	文献类型	作者	西班牙的表記法
《采覧異言》	1713	书籍	新井白石	伊斯把你亞、伊西把你亞、イスパニヤ、イスパンヤ、スパンヤ
《西洋紀聞》	1715	书籍	新井白石	伊斯把你亞、伊西把你亞、イスパニヤ、スパンヤ、イスパニヤア、イスイパニヤア
《山海輿地全図》	1785	地图	长久保赤水	伊斯把你亞、イスハニヤ、スハン
《紅毛雜話》	1787	书籍	森島中良	伊斯巴你亞、いすばにや
《萬国新話》	1789	书籍	森島中良	伊西把尼亞、いすばにや
《輿地全図》	1792	地图	司馬江漢	イスパンヤ
《萬国略説》	1793	书籍	司馬江漢	伊斯巴尼亞、いすはにや
《蠻語箋》	1799	书籍	森島中良	伊斯把泥亞、イスパニヤ
《訂正増訳采覧異言》	1802	书籍	山村昌永	伊斯把你亞、イスハニヤ
《新刻總界全図》	1809	地图	高橋景保	イスパニヤ
《新訂萬国全図》	1810	地图	高橋景保	伊斯把你亞、イスパニヤ
《萬国一覽図説》	1810	书籍	古屋野意春元鄰	伊斯把你亞、イスハニヤ
《坤輿図識》	1846-1847	书籍	箕作省吾	伊斯把泥亞、イスパニア
《航米日録》	1860	日记	玉虫左太夫	伊斯巴尼亞、伊斯波尼亞、イスハニヤ、イスパニヤ、パニヤ
《増訂華英通話》	1860	字典	福澤諭吉	大呂宋
《洋学便覧》	1866	书籍	柳河春三	是班牙、以西把尼亞、大呂宋、イスパニヤ
《輿地志略》	1871	书籍	内田正雄	西班牙、スペイン
《英和字彙：附音插图》	1873	字典	柴田昌吉、子安峻	西班牙
《萬国史記》	1879	书籍	岡本監輔	西班牙
《訂増英華字典》	1884	字典	井上哲次郎	西班牙、大呂宋
《萬国通鑑》	1888	字典	長谷川郁馬	西班牙
《日本大辞書》	1892	字典	山田美妙	西班牙
《高等小学地理書》	1894	书籍	鈴木直三郎	西班牙
《小学地理》	1900	书籍	文部省	西班牙

15) 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234页。

统计结果显示：

1. 在 1860年以前的 14 种文献中，“西班牙”的译词形式都保留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有“伊斯把你亞”、“伊西把你亞”、“伊斯巴尼亞”、“伊斯波尼亞”等几种变体形式。

2. 1860年以后的文献中，开始出现“西班牙”的同音异字的译词形式，并逐步摒弃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统一使用“西班牙”。

综上，在“黑船事件”后，日本逐渐打开国门，引入中国的汉译西书、英华字典等文献。在此过程中，日本作者受引入中国文献的影响，逐步摒弃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转而统一使用以“Spain”为转译对象的译词形式，从而推动了国名译词“西班牙”在日本的定型。

五 结论

国名译词“西班牙”的定型大约经历了 300年的时间。以“España”为转译对象的国名译词形式在鸦片战争后，逐渐被以“Spain”为转译对象的国名译词形式所取代。

在这一过程中，19世纪初，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来华新教传教士们开始翻译《圣经》，在对“西班牙”的翻译过程中，重新使用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们的译词形式，对耶稣会士的地理学知识进行了再导入，并为国名译词“西班牙”提供了雏形。普鲁士传教士郭实猎则最先将“西班牙”的译词形式运用到报刊和地理书中，为国名译词在鸦片战争前后大量进入汉字词汇系统提供了重要素材。中国士大夫魏源、徐继畲等人又对“西班牙”的各类译词形式进行了整理和筛选，最终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由益智书会的传教士们编译的各类书籍帮助“西班牙”完成译名的彻底定型，并一直在除外交类文献的其它各类文献中广泛运用。在外交资料方面，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条约中使用了“西班牙”和“西國”的译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西班牙”的定型。而中华民国政府则一直使用“日斯巴尼亞”的译词形式，并未对“西班牙”的定型起有效推进作用。

反观一直通过汉译西书了解世界的日本，在早期兰学家的作品中，多是保留了早期来华耶稣会士汉译西书中的国名译词形式。1859年日本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后，中国士大夫们的著作和一些传教士编写汉译西书流入日本，直接推动了“西班牙”在日本的定型。